

說文解字概論



周雙利

著

李元惠



东 汉 许 慎

ABP92/08

北宋徐鉉定本之《说文解字》

目 录

序 言	(1)
第一章 为什么要学习研究《说文解字》	(4)
第二章 《说文解字》与中国的传统文化	(20)
第一节 汉语言文字的民族特征与《说文解字》	(20)
第二节 《说文解字》所体现出来的中国古代传统文化	(32)
第三章 《说文解字》的作者许慎与《说文解字》成书的经过	(61)
第四章 《说文解字》对汉字的归类分析与解说	(81)
第一节 《说文解字》对字体、字形的归类与分析	(81)
第二节 《说文解字》对字义、字音的分析与解说	(109)
第五章 文字学的通论——《说文解字叙》	(138)
第一节 关于汉字的起源与发展	(138)
第二节 汉字构造原则与许慎提出的六书说	(166)
第六章 《说文解字》对后世的影响	(187)
第一节 “许学”——历代对《说文解字》的研究	(187)
第二节 《说文解字》对后世字典词典编纂的影响	(212)
第七章 《说文解字》的查检与运用	(223)
附录:	
许慎的训诂学理论与方法	(248)
试论段玉裁的“以字考经,以经考字”	(260)

序

当这部《说文解字概论》讲稿问世时，著者的心情是十分复杂的。套用一句文言则是“感慨系之矣”！从前，我读文字学研究生时，曾就学于陆宗达先生。先生曾向我们讲授《说文解字》，以此来奠定我们文字学的基础。那时，我们年轻气盛，心有旁骛，于先生所教，只不过领会十之一、二罢了。不久便被分配至内蒙民族师院去工作。由于“工作需要”，只能去教古代文学的元明清部分，但私下却眷恋着文字学。只可惜那时的图书馆没有几本文字学方面的书，也缺少这方面的师友可供讨教。无独有偶，中文系的李元惠兄，是内大中文系专学语言文字学的高材生。由于有了共同的爱好，有时便就一些语言文字学的问题相互质疑问难。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一度我曾发愿从古典文学回到语言文字的老本行，但由于种种原因而未果。一种愿望被压抑，便要宣泄出来。所以在无可奈何之余，在教古典文学之暇，我又重理“旧学”，每年给学生开一点文字学的专题。我同李元惠兄互相讨论，慢慢编成了讲稿。讲稿是以陆宗达先生的师说为基础。我们的讲稿只能说是学习陆宗先生的《说文》之学的一点体会。开初以此为讲稿，讲授《说文解字》，有点温习旧业，不要荒疏了的意思；另一方面又想借《说文》来给学生打一点文字学的基础。我们草成讲稿后，曾由我给几届中文系的学生开过专题课，讲授了几年。七十年代中期，初稿曾以我和李元惠兄的名义，交出版社，以便印成册子作为教材发给学生。出版社看过初稿后，说：“学术性太强，且又排印困难，怕赔钱。”原稿被退回了，算是被“枪毙”了。现在搞文字学，实在太难了，单是稿子中的古字、难字，就使任何一个刊物编辑部与出版社感到头疼。但是不管怎么说，文

字学这几年进步很快。单就《说文》之学，陆宗达先生的《说文解字通论》几经磨难，多年前已由北京出版社出版；其后，蒋善国先生的《说文解字讲稿》、任学良先生的《说文解字引论》、王梦华老师的《说文解字部首举要》等相继问世。关于专释《说文解字》部首的书，康殷、姚孝燮先生曾有大作出版。另外，又有《说文解字约注》、《说文解字译注》等，陆续出版，《说文》之学也算并不寂寞了。许学即《说文解字》之学，在有清一代可谓极盛，流风余韵衍及本世纪初，研究《说文》的人也不少。从前，读文史的大学生，如不知道《说文解字》一书，就会被人讥为无知。然而，曾几何时，人们在重理轻文，重文轻语的心态影响下，不知道、不熟悉《说文解字》已是司空见惯，见怪不惊了。这也无可厚非，现代社会是科技发达的时代，人们倾心于声光电化，是时代使然，经济建设的需要如此。这一切，都无可厚非。试看拉丁文之在欧洲，大约也是被视为冷落的“古学”了吧？但是不管怎么说中国的传统文化，还是要继承发展的。《说文解字》对于学习汉字学、音韵学以及训诂学还是入门的奠基之作。要搞好语文教学、专攻古文字学以及书法的人，似乎还得看一看《说文解字》，即便要研究文化学、符号学一类的新学科，《说文解字》在中国文化史上的突出地位，本身就不容忽视。《说文解字》的价值并未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有鉴于此，我们不揣浅薄，在学习师说的基础上，编成这本概论式的东西，以贡献给年青的朋友。书中对章太炎、黄侃、陆宗达、王宁诸先生的论列，时有引述，师承如此，不忘师说也。关于许慎的阴阳五行观念，多采自邹晓丽先生的说法，在此一并说明。本书的封面题字，出自我国著名书法家温同春先生手笔。温老多次赐其墨宝，虽不能当面拜谢，但心中无时或忘。封面设计，出自王之山同乡之手。版面也是他托朋友所赐。此书排印相当费力，多亏了印刷厂的朋友的艰苦努力，才能使这本书与大家见面。当然，此书之出版，还多亏了香港新世纪出版社马建刚先生的热心于发展华夏文化，这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

此外，还要提及的是，书后附录了两篇文章，附录的原因，一是

因为都同《说文解字》之学有关；二是，这两篇稿子也挺难印刷，加上又是陶涛当年在内蒙时，我们的合作的产物，一并印出来，以示纪念。我和李元惠兄合作欲印此类书，到如今终于奉献给读者，倏忽之间，将近十年。我们都已华发染鬓，将要进入老年了。抚今追昔，情何以堪！人老了感慨特多，我现在的感慨便是：一个人在人生的道路上迈步前行时，有时抬头一看，似乎满眼都是朋友，但一到了人生的关键时刻，真正帮助你的朋友，又有多少呢？呜呼！谨将此书献给我们人生道路上的真正的朋友吧！

最后，附带说明的是，我们地处偏僻，信息不灵，读书不多，又往往囿于旧说，加上我们脱离文字学的前进轨道甚久，因而书中错误疏漏之处，在所难免，还望朋友们指正为幸。

周双利

1992年12月28日于通辽

第一章

为什么要学习研究《说文解字》

我们学习语言，书写文章，都要从识字开始，因为汉字是记录汉语的符号系统。要把汉字运用得正确无误，就要对汉字的历史、现状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有一个系统的了解。如果有的青年同志，已经跨入师范院校中文专业的大门，将来绝大多数人是要当语文教师的，那么，他们对汉字正确地进行了解，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己不正，焉能正人”，自己对汉字认读得不正确，书写得不规整，解释得糊里糊涂，如何去教别人学习中国语言文字呢？己之昏昏，无法使他人昭昭。我们历来主张学中文的同志，应当学一点文字学的基础知识，而学习文字学的入门根底，则是学习研究《说文解字》。正是从这一认识出发，我们才向大家介绍《说文解字》这部著作。

如果有的同志问道：今天学习研究《说文解字》有什么作用，其意义何在？

第一，学习研究《说文解字》，可以为学习文言文打下文字学的基础。

我们的汉语可分为两个系统，一是口说的，这是口语；二是用汉字记录下来的汉族人民的语言，这是书面语。在古代，当汉字刚刚记录汉语时，口语与书面语是一致的，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言、文分家，口语与书面语彼此脱节。我国的古代汉语，特别是文言文，基本上是以晚周口语为基础，用汉字记录下来的书面语。这种书面语，我们称它为文言文。我国古代关于文学、艺术、哲学、历史、科学技术等方面的著作，基本上都是使用文言文作为语言的表达形式。这种文言文，运用古代汉字这一符号系统，将汉语这种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相对稳定地固定下来，也就是说，汉字将汉语的符号

固定在约定俗成的形象里。时间一长,造成了诚如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所说的一种矛盾:“词的书写形象使人突出地感到它是永恒的和稳固的,比语音更适宜于经久地构成语言的统一性。书写的纽带尽管是表面的,而且造成了一种完全虚假的统一性,但是比起自然的唯一真正的纽带,即声音的纽带来,更易于为人所掌握”,“到头来,人们终于忘记了一个人学习说话是在学习书写之前的,而它们之间的自然关系就被颠倒过来了。”(《普通语言学教程》50页)由于文言文是同现代汉语口语脱节的书面语,我们今天为了继承古代中国的优秀文化遗产,便不能不阅读、理解文言文,而今人学习文言文,困难很大,要克服这种困难,不但要具备文化、语言方面的基本修养,还要懂一点汉字学。这就是古人所说的通一点“小学”。章太炎先生在《国学概论》中,曾说:“韩昌黎说:‘凡作文章宜略识字’,所谓识字,就是通‘小学’的意思。作文尚须略通‘小学’,可见在现在研究古书,非通‘小学’是无从下手的了。”据太炎先生的意见,通“小学”有三法,即“通音韵”、“明训诂”、“辨形体”,他指出:“历来讲形体的书是《说文》(即《说文解字》的简称,下同);讲训诂的是《尔雅》;讲音韵书是《音韵学》。”(《国学概论》1929年上海泰东图书局印行,15—17页)如果一个人对小学有了基础,对所遇到的一个汉字,从形体、读音、字义都弄清楚了,就不会产生“形误”、“音误”、“义误”的毛病了。否则,读古书,很容易产生“望文生义”的臆断。如,贾谊《过秦论》中有这样一句话:“秦王既没,余威震振于殊俗”,见于宋黄善夫《史记·秦始皇本纪》。唯黄善夫本,余威后面连用“震振”二字,其他本子的《史记》,或者《昭明文选》、《贾子新书》等《过秦论》,这句话,不是变为“余威震于殊俗”,就是变为“余威振于殊俗”。现在出版的注释本历代文选,凡选注《过秦论》时,都认为震振同义,因同义而误衍一字,故皆删去一字。其实,这是没有读通这句话,按“震”字,《说文解字》(十一卷下)说:“辟历振物者。”《广雅疏证》九卷上,说:“震、𩇑、𩇑,雷也。”这就是说,震的本义是霹雳振物的雷。“振”字在本句中当震动讲。《过秦论》中

的这句话意思是说：“秦始皇已经死了，他的余威象雷霆那样震动达于远方。”“震”在原句中，以名词作状语，同作动词的“振”，搭配使用，并不是同义语的重复，因而将其中之一的文字作为误衍删去，则是错误的。只有黄善夫本的《史记》还保持着原貌。

我们阅读文言文，切忌“望文生义”。譬如我们读《史记·李将军列传》，李广有一次受伤被匈奴人所俘，他假装伤重晕死过去，后趁人不备，夺胡儿之马逃走，文中有李广“抱儿山中”一句。我们遇到“抱”字，不能以今义望文生训，那就会理解为李广心怀人道主义，逃命时还怀抱匈奴少年人。其实抱、抛同音假借。“抱儿山中”，就是“抛儿山中”，如果望文生训，就会把文义弄颠倒了。由于时间差异与地域的差异，望文生训的事经常发生。王引之在《经义述闻》卷三十二“形讹”条中，指出：

经典之字，往往形近而讹，仍之则义不可通，改之则怡然理顺。如，夫与矢相似而误为矢（见《春官·乐师注》），雷雍与卢维相似而误为卢维（见《夏官·职方氏注》，盖雷误为庸，又误为望），斛字古文与觚相似而误为觚（《考工记·梓人疏》引《郑驳五经异义》），四字古文与三相相似而误为三（《觐礼注》），瑑与琢相似（《礼器》大圭不琢注云：“琢当为篆。案琢盖瑑之误，瑑亦篆也），神字古文与旦相似而误为旦（《郊特牲注》，说见《礼记》中），叟与更相似而误为更（《太平御览·礼仪部十四》引《月令》章句），疏与流相似而误为流（《昭二十年左传释文正义》），……

以上是由于不辨形体，造成形误，而误读古书的例子。还有的是，古人已望文生训，造成误释词义，直到如今，仍沿其误谬的，象“蛾眉”，唐骆宾王《为徐敬业讨武曌檄》一文，中有“入门见嫉，蛾眉不肯让人”一句。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古文观止译注》，在注释“蛾眉”一词时，说：“蛾眉，眉细长，如蚕蛾之眉，形容女子美貌。”蚕蛾之眉是什么样子，人们说不清楚，蛾眉便是美的眼目，更令人费解。“蛾眉”形容美女，最早见于《诗经·卫风·硕人》：“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螭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蛾眉用来形容螭首，同上文的描绘硕人的手、肤、颌、齿相对应，并非是从“螭首”又说到“眉目”。朱熹《诗集传》解释螭首蛾眉：“螭，如蝉而小，其颌广而方正。蛾，蚕蛾也。其眉细而长曲。”后人注《诗经》多取朱熹之说。高亨《诗经今注》也说：“螭，虫名，似蝉而小，颌广而方正。蛾，蚕蛾，其触须细长而弯。”其实，蛾眉，最初是娥媼的通假，表示美好，姣好貌。刘师培《古书疑义举例补》“两字并列均为表象之词而后人望文生训之例”条中说：

扬雄《方言》云：“娥媼，好也。秦晋之间，凡好而轻者谓之娥。自关而东，河济之间谓之媼。”郭注云：“今关西亦呼好为媼。”又《说文》云：“媼，目里好也。”《列子·周穆王篇》云：“简郑卫之处子娥媼靡曼者。”张湛注云：“娥媼，姣好也。”是娥媼二字，为形容貌美之词。《诗·卫风·硕人》“螭首蛾眉”，蛾眉螭首，非并列之词也。蛾眉二字，即系“娥媼”之异文，眉媼又一声之转，所以形容女首之美也。《楚辞·离骚经》云：“众女嫉予之蛾眉兮”，蛾或作娥。王逸注训为“好貌”，则亦以娥媼之义，解蛾眉矣。又景差《大招》云：“娥媼曼兮”，扬雄赋云：“虬妃曾不得施其蛾眉。”均与《离骚经》蛾眉之义同。至于魏晋之时，始以眉为眉目之眉，如晋陆士衡诗云：“美目扬玉泽，蛾眉象翠翰。”以眉对目，而眉媼通转之义亡矣。若唐颜师古注《汉书》谓：“眉形有若蚕蛾，故曰蛾眉。”则并不知蛾眉之通假，可谓望文生训者矣，近人多从其义，失之。

以上的例子告诉我们，要读通古书，明白文言文的词义，必须通小学，有文字学的基础，为此，就要以《说文解字》为入门之学。《说文解字》是以文言文形成时期的语言材料为对象，它解释的文字，构成了我国文言文的基础。《说文解字》解说文字时，大量征引先秦以来的文献为证据，所征引的文献，除五经而外，引用先秦两汉人的著作达四十余种，如《老子》、《韩非子》、《山海经》、《司马法》以及《汉律》、司马相如文、扬雄赋等。《说文解字》所依据、所解释的语言材料，恰好构成了我国文言文的基础，因此学习、研究《说文解字》，可以为我们正确无误地阅读古书，研究文言文奠定基石。

第二,研读《说文解字》,可以为研究我国的语言文字学打下基础。

《说文解字》不仅仅是一本字典,许慎通过对一万多个汉字的归纳整理,对字体、字形的解说,提出了系统的文字学的观点。许慎又通过对字义(更多的是词义)与字音的解说,又提出了一套语言学的系统观点,这些观点都是具有开创性的,对建立具有汉民族风格的语言文字学都是起了奠基石的作用,因此研读《说文解字》是十分必要的。

人们要研究汉字形体学,或者说研究文字学,《说文解字》是必读的入门著作。《说文解字》对研究汉字发展史与汉字形体学的作用,自甲骨、金文大量发现后,人们发觉《说文解字》对有些文字的解说,并不可靠,这是因为许慎当时没有见到甲骨文,他所见到的钟鼎文字也有限得很,因而对古文字的解释,就不可能完全做到“就初形解释古义”。他只能以他那个时代所能见到的文字材料作基础,判明词的本义与引申义等等。随着文字新材料的大量发现,似乎是动摇了《说文解字》的权威性,但是我们能不能因甲骨文、金文的新发现而完全否定《说文解字》呢?当然不能。任何事物都不是一成不变的,都是在发展中前进的。研究学问也是如此。任何一门科学,要发展前进,都要从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出发,批判地加以继承,才能继往开来。许慎的《说文解字》完成于公元121年,它是分析汉字形音义的最早的一部经典性著作。在文字学方面,他提出的汉字形音义三分法,他提出的汉字六书结构原则,他对汉字以及东汉以前的古汉字的解说,他提出的用偏旁进行汉字归类等,都是具有开创意义的。他生于汉代,去古未远,对有些字义的解释,赖他的解说,才使古义流传下来,让后人有了进一步研究的基础。生于后世的人,特别是今天的人们,由于新材料的不断发现,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们对汉字的认识,比起许慎来,更加深入,更为科学些,这是很自然的事,但不能由此而抹煞前人的劳动与发现。《说文解字》是有它的历史局限性,这部书所采用的文字材料,多半是战

国、秦汉时的文字，少数是西周晚期的史籀大篆与郡国山川出土的铜器铭文。他认定孔子壁中古文是中国最古老的汉字，这是一种误解。这种古文并非殷周古字，而是战国时东土六国文字。所以，经他考释的一些古汉字，在字形上已有了简省、讹变，字形已失去远古的构形，许慎由此而提出的个别文字的解说，难免失误。但是，我们也应清醒地估计到，许慎所依据的秦汉战国以及西周晚期以来的文字，正是我国汉字发展的中间环节时期的文字，即汉字由古篆体向隶、楷演变之前。许慎解说的文字，尚能保存古篆体结构的笔意，我们可以依靠许慎的解说来释读晚周以前的文字，我们当然可以在许慎提出的汉字发展史的观点、汉字形、音、义一贯论以及六书结构原则的基础上，提出更科学的文字学的观点。今天研究甲骨文、金文的人，大多以《说文解字》为基础，就以甲骨文考释的著作与甲骨文字典的编纂来看，从一九一五年以来，出现过：

《殷虚书契考释》	罗振玉著	1915年印行；
《簠室殷契类纂》	王 襄著	1920年初印；
		1929年重订；
《殷虚文字类编》	商承祚类次	1923年初刻；
	罗振玉考释	1927年删校；
《甲骨学文字篇》	朱芳圃	1933—1934年印行；
	孙海波集	1934年刊印；
《甲骨文编》	商承祚校	1965年重编重印；
《契文例》	于省吾著	1940—1943年刊印。

以上关于甲骨文的著作与字典，其考释文字以及文字的编次，都是以《说文解字》为基础。甲骨文字典均按《说文解字》部首的排列次序排比，其对甲骨字体的辨释，以对照《说文解字》所收的篆体作为基本的出发点。如孙海波所编的《甲骨文编》收单字4672个，人们认识一千多个。这一千多个字争论不太大，其主要原因是有《说文解字》的字形与解说可资参照。考释甲骨字，不外有比较法和推勘法、偏旁分析法、历史考证法等，不管使用哪种方法，都需要利用《说文解字》作桥梁。我们试举一例：于省吾在《甲骨文字释林》中

“释或”说：

甲骨文或字或作或形。郭沫若同志释伐(通考八〇)，不可据。或即臧之初文。说文：“臧，善也，从臣戕声。”按以甲骨文为据，则应作从或戕声。或字加戕为声符作臧，乃后起字，……

“释鲁”又说：

说文：“钝词也。从白鱼声。”按甲骨文鲁字作，从鱼从口，口为器形，本象鱼在器皿之中，说文误为从白。甲骨文称：“乙丑卜，古贞，帚姁鲁于黍年。”(佚五三一)又：“□□卜，王隹正商，允鲁。”(佚六九三)商承祚同志以为“渔而卜”，非是。鲁与旅音近字通。书序嘉禾篇“旅天子之命”，旅字史记周本纪作鲁，鲁世家作嘉，鲁与旅均应训为嘉，故鲁世家以嘉代诂。嘉为美善之义，故典籍中训嘉为美为善者习见。……尤可证鲁为美善之义。至于说文训鲁为钝词，乃后起之义。

由以上的例证，我们可以看出研究《说文解字》在研究文字学方面所起到的作用。

至于说到《说文解字》在音韵学方面的作用，也是十分重要的。我国古音学的研究，自宋代吴棫(yù)著《韵补》以来，探求古音，一般都是根据古代的韵文如《诗经》、《楚辞》、《易经》等，由此推求古音，弊病在于，有时只能推出古韵，不能得其声，或者只能得其声而不能得其韵。由于是从静止孤立的状态中推求古音，押韵偶有异同，各种解说就出来了，什么叶韵说、合声论等，加之古人韵部分合不同，使人一见头昏目眩，莫衷一是。所以，研究古音韵的人，除注意古韵文而外，也开始注意到《说文解字》。黄侃论及《说文解字》在研究声韵学上的价值时提到：

1、《说文》形声字，为数至多，据偏旁以求音，除后世变入他韵音，大概可以得其颉理。如移、蓐、逯、移，皆从多声而入影；哆、疹，则入端；𦵏、𦵑、𦵒、𦵓、移、𦵔则入掌，此可明多之为声，兼入喉、舌也。芳、𦵑、𦵒、𦵓，皆从为声而入为；防、𦵑，则入晓；𦵑则入见；𦵑、𦵑则入疑；此可知为之声，又兼入喉、牙也。此依形声得声之本之

一术也。

2、《说文》重文字，为数至多，可以得韵类同部之关系。如髡，或作髡，髡实从元声，可以知兀、元本为同韵也。𣎵，古文用𣎵，𣎵从殳声，𣎵从豆声，可以知殳、豆本为同韵也。瓊，或作璇，璇实从旋省声，可知𩇛、旋本为同部也。此依重文得声之本之又一术也。

3、《说文》训释，往往取之同音。如天之训顛，知天、顛，后世音异，而古人之读可通。吏，治人者也，知吏、治，后世音异，而古人之读可通。自此以后，帝、帝、履、礼诸文，更仆难数。要之，《说文》说解中，字与声韵无干者至少。此依说解得声之本又一术也。（《黄侃论学杂著》106页）

黄侃先生还提出据《说文》的重文、说解、读若以及无声之字与有声之字可以推求声音的正变。是指明了依据《说文解字》研究音韵的一条途径。古代的音韵学家、文字学家曾沿着这条道路取得过可喜的成果。如清人严可均撰《说文声类》，据《说文》谐声字，分古韵十六部；段玉裁著《六书音韵表》分古韵十七部。他的弟子江沅作《说文解字音韵表》，也分古韵十七部；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古韵分部多本段氏，但依据于《说文》，多有发明。至于音韵学家研究古代声母，其本于《说文》谐声字者，那就更多了。总之，《说文解字》为研究古音韵提供了极丰富的资料！

《说文解字》一书对研究语言学，特别是词汇学、词源学的意义就更为巨大而又重要了。

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实际上提出了一个汉字形音义一贯的原则，由分析汉字的形、音、义，进而研究每个字（实际是词）的本义、引申义与假借义。许慎的这一观点对研究词义的发生、演变具有巨大的意义。汉字形音义三者是否一贯，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但是，由词的本义而求引申义，这种做法本身是承认“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因而词义是一个发展变化着的动态结构，这个思想是符合语言科学的实际的。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元”下注云：“凡文字有义有形有音，《尔雅》已下，义书也；《声类》以下，音书也；

《说文》，形书也。凡篆一字，先训其义，若始也，颠也是。次释其形，若从某某声是。次释其音，若某声及读若某是，合三者以完一篆，故曰形书也。”《说文解字》通过形音义的解析，试图找出本字、假字，找出本义、引申义的系统，如“天”字，许慎《说文解字》说：“天，颠也，至高无上，从一大。”许慎认为“天”的本义是指人的头顶。至于作天地之天的词义，乃是引申义。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说：“颠者，人之顶也，以为凡高之称。……然则天亦可为凡高之称。臣于君、子于父、妻于夫、民于食皆曰天是也。”天，作为“颠”，指“人之顶也”，是本义，引申为“凡高之称”的天，为引申义；臣称君、子称父、妻称夫、民称食为“天”，乃是“天”的假借义。“天”的本义在今天已不多见，古代还出现过，《山海经·海外西经》：“形夭与帝至此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形夭，王念孙以为应作“形天”，不确。陶潜《读山海经诗》“形天舞干戚”，作形天，也即刑天。刑天即刑于“天”，也即刑于头顶者。《易经》：“其人天且劓(yì)”，马融释为“黥凿其额曰天”。天的本义是头顶(颠)，名词，用为动词“黥凿其额曰天”。从天为头顶之颠，我们还可以看出词的同源变化。《诗经·周南·麟之定》，毛传说：“定，题也。”有的本子异文“题”作“颠”。天、颠、顶、定、题，古代同一声纽，都是指头顶部分，可视为同源。

《说文解字》对词义的本义、引申义的研究，实际上为后世词源学的研究指出方向，提供丰富的资料。例如常、识、职、志，现代汉语中是各不相属的词，即便在文言文中，也各有自己的“义项”。职当职守、职业讲，《周礼》“民各有职”；识，当识知讲，如“君子是识”（《诗经》）；志，当志向讲，如“盍各言尔志”（《论语》）；常，当下裙讲（见《说文解字》卷七下），借为经常之常，当长久、固定讲，如“天行有常”（《荀子·天论》）。以上为这几个词的常见意义。但是，如果我们参照古代文献，便会发现上述几个词有本源的联系。

常，即太常，旗名。《周礼》有“司常”，即主管旗帜的官吏。《周礼·春官宗伯下》说：“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属，以待国事：日月为常，交龙为旗，通帛为旂，杂帛为物，熊虎为旗，鸟隼为旟，龟蛇